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

经君健

一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可以以其是否承担政府经济任务（主要指中盐和经手政府汇兑业务）分为两大类 姑名之为‘官商’或‘大商’和‘民商’或‘小商’。两类商人的性质迥异。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中的‘民商’或‘小商’是同时为城乡小商品生产者、城市居民和地主、官僚服务的，换言之，他们既为生产者服务，也为消费者服务。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中的‘官商’或‘大商’除具有与‘民商’相同的职能之外，其主要特征是，国家把他们当作施行财政政策和边饷供应的一种工具。

二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的利润实现方式是贱买贵卖，其前提是不等价交换，其条件是地区差价和垄断价格的存在，其所得利

一、兴衰论考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

从历史广角析晋商

晋商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河东盐商的兴衰

明清时期北方边境贸易与晋商的兴衰

晋商是最早的期货经纪人

明清时代榆次商人的外向型特色

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

晋中商人的外贸思路及借鉴

山西商人信件述略

润的来源不是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而是最终来自小生产者，直接表现为剥削一切与之发生经济关系的对象：小生产者、消费者、债务人，乃至包括官僚和政府(财政)。

明清山西商人的存在条件反映了小商品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当低下；也反映了全国性的生产力地区性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存在。

山西商人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诸如粮、棉、盐、铁、木等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运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人户外出经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山西某些州县人多地少的矛盾，减轻了因地瘠而民贫的现象。

明清山西官商(或“大商”)的存在说明，明清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它们善于利用经济政策杠杆去动员民间力量为其所用，以满足军事上的物质供应和饷源及财政上的需要。

三

从整体上看，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的运转方式和它本身的经营方式，都与地主制经济的结构是完全协调的。他们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无论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有多么巨大的发展，也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相反，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只是在传统的流通领域中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它与产业资本无关；一旦现代产业资本产生和发展，原来意义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性质就逐渐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

从历史广角析晋商

赵荣达

近年来，晋商这一历史课题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大量论文专著的发表，初步廓清了晋商活动的基本脉络和成功之道，也给当今经济发展诸多启示。但是，综观晋商这一历史现象，仍有一些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明清之际，全国商品经济普遍发展，十大商帮逐鹿神州，山西既不是全国经济最繁盛之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何以晋商独占鳌头，称雄全国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快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山西票号为何恰恰这个时期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全国金融执牛耳者，创造了经济史上少有的辉煌？可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后，晋商这支劲旅却猝然衰亡，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去得那样神速悲凉，这又是为什么？要寻求比较客观真实的答案，须从全国经济史、金融史、商业史的角度审视、思考和探索。

一、晋商的发展轨迹

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山西商业发展状况的文献，当属《国语·晋语》。这是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的一部史籍，它对晋国经济政策

做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概括。

从战国直至元代前,很难找到明确叙述晋商的史料。一些现代人的文章、著作曾点到过这段历史时期山西出现过的几处商业城市的名字,但找不到有关商业发展程度的古代文献作依据。

元代山西商业发展情况,《马可·波罗游记》有一段明确记载:“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府,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人。这里盛产丝。”这一段描写说明太原到临汾的汾河谷地,元代商业比较繁荣。不过,马可·波罗把方位搞错了。平阳在太原之南,而不是西。至于平阳盛产丝,也还不多见记载。这篇游记反映的山西商业资料还是珍贵的,可供我们研究晋商时参考。

到了明代,山西商业发展情况,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大都散见于明人的笔记、小说、文稿中,不过,反映明初情况的并不多见,大都集中在嘉靖、万历年间。如:

明嘉靖进士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河以北为山西……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独近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商贾争趋。”

明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万历人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盛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从山西商人经营地域看,南方商品经济繁荣区都有他们的足迹。明万历举人宋应星在其《野议·盐政议》中披露扬州商业情

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成书于清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但专记明末史事的《明季北略》中，作者记述说：“湖北云梦，城内多山西商贾。”

此外，我们从明人文献中还可查获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山西名商的有关资料，如王文显、王海锋、张四教、范世逵、展玉泉、杨继美、李明性等。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更实际地反映出明中后期晋商的兴盛情况。

进入清代，综合反映晋商概况的史料日渐增多。首先，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清世祖实录》载 顺治元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有仁向皇帝进言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矣。”

《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89 年）二月上谕中言：“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

《雍正朱批谕旨》载，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五月九日，大臣刘于义奏疏中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三天之后，雍正帝朱批回复云：“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另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二月十二日，大臣石麟的奏折也说：“晋省民人，经营于四方者居多。”

雍正朝《皇清奏议》中载，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大臣刘于义在《敬筹晋省积贮疏》中说：“平汾为山西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

《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1773 年）十月己丑条云：“浑源、榆次二州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

笔者没有查到嘉庆朝的记载。

道光二年(公元 1786 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断言:“山西号称海内最富。”

《清宣宗实录》载,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 年)三月上谕:“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

咸丰年间《军录》载,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十月十三日,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奏折中介绍晋中一带富庶之况,举例说:“……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与官方文献相互映证的是地方志资料:

明版方志现在为数不多了。但从仅存的《永乐大典·太原府志》和万历版《太谷县志》看,明末晋中平川几县商业虽已发展,但还不算很兴盛。其风俗仍以‘慕学力田’为主流;‘灵秀者亦于贸易焉’(万历版《太谷县志》)。但进入清初就不同了,清顺治版《云中郡志》云:“商贾俱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乾隆版《榆次县志》云:“丈夫勤苦务本,习尚节俭,资商贾,善治生而多藏蓄。”乾隆版《太谷县志》云:“阳邑于今称繁阜,商贾辐辏,通衢为之狭。”光绪版《平遥县志》则肯定地说:“平遥地当冲要,实为川陕通衢,富贾云屯,甲于晋省。”

除官方文献、地方志外,名人笔记、小说触及的晋商资料就更多了。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戴莲芳的《鹏铨研质言》、俞樾的《茶香室续钞》、徐珂的《清稗类钞》都保存了与上述史料相佐证的晋商资料。

现在,史学界基本公认山西票号是以道光初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店改组日升昌票号始创办的,直至辛亥革命爆发票号纷纷败亡。

这方面的专题性史料，虽尚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丰富的。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 年编辑出版了《山西票号史料》，保存了票号合约、号规、信函、账簿和后人研究论文等大量原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祁、太、平三帮票号业发展梗概。

通过以上史料回顾，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晋商滥觞、发迹、鼎盛、辉煌、衰败的发展轨迹。

滥觞期历史跨度很大，从战国至元末。当时晋商在全国商业活动中比较活跃，但尚排不到什么位次。不过，说山西有悠久的商业历史传统则是毫无疑义的。

发迹期起于明代，大约应是弘治至万历年间。从地域看，晋商发迹晋南蒲州、平阳一带，后扩及晋东南泽州、潞州。至明万历年间，晋商问鼎全国，开始取得十大商帮之首的位次。

鼎盛期，从明万历年间至清道光初年，晋商一直在全国商界领先。但在晋商内部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明末至清初，晋商的中心区域由南向北推进，晋中盆地商人崛起，逐渐超过晋南和晋东南商人，取得了代表晋商的资格。

辉煌期，从道光初年始至光绪末年，晋中商人创办的票号业，将晋商带入金融业领域，并一度操纵了全国的金融，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少有的辉煌。

衰败期，从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短短不足三年时间，山西票号迅速土崩瓦解，晋商也从此一蹶不振，无可奈何地摘下了全国商帮之首的花环。

研究晋商发展轨迹，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晋商会在明中后期问鼎全国？二是为什么晋商中心会发生由晋南向晋中的转移？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属于晋商兴起原因的延伸。

晋商明代崛起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晋商发祥地晋南，自古就是河东盐池所在地，有盐这种重要商品可供经营。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地商业要发展，首先产品要有剩余，有可与人交换之物品。恐怕这是商业发展的最原始动因。第二，一地商业的发展是和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分不开的。明代我国商品经济是一个空前的发展期，过去史学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了全国这样一个大环境，晋商才会有用武之地。不过，这里必须指出：晋商故乡晋南，在当时并不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晋商的成功，不是因为故乡是商业区，而是由于他们走出故土，参与到了全国商业竞争中去。第三，晋南和晋东南在地理位置上便于参与全国市场交易。元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晋南、晋东南属这些中心地的拱卫区，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开展。第四，是人为的和政策的因素。晋南自宋、元以来，战事较少，社会安定，人口偏多。明初移民，晋南是重点，这就使晋南人散布到了全国，为晋商外出活动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再就是明初开中法的实施，是调动晋南商人外出经商的一个重要动因。而弘治年间开中“纳粟”改“折色”，又是使晋南商人由边商转内商的重大促进因素。当然，开中法也好，折色制也罢，都是朝廷向全国出台的经济政策，不独供山西人享有，可山西人抓住了这个机遇，这是晋商成功的重要的主观因素。

至于明末清初，晋商中心由南部向中部地区的转移，我认为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首先，晋中盆地数县地势平坦，适宜农耕，农村剩余产品较早地转化为商品，为商业的起步创造了条件。但中部一向缺乏大宗拳头商品，既无盐丝之便，又少煤铁之利，所以在商品经济的优势发展上比晋南、晋东南相对晚一个节拍。其次，晋中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晋南、川陕等通往省会太原和京都北京的通道，但元代以前，政治经济中心偏南，这方面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元代定都北京，这条交通线就热起来了。到明代全国商品经济大发展，北京中心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晋中通道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

了。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明万历以后,晋中有了稳定发展商业和开发北边贸易的良好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晋中商人走向北边,走向全国。谈到山西商业发展原因,多数学者重视明初开中法和明中期折色制对晋商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对晋南商人是比较适宜的,但加到晋中商人头上就未必准确客观。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晋中在元末的军阀混战和明中期的蒙古边祸中都是战乱的波及区。元顺帝至正年间,在镇压元末农民起义中起家的两支军阀索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经常为争夺太原而起战争,造成太原附近人民死的死、逃的逃,幸免于战火的微乎其微。《太原史话》作者郝树侯先生曾判断说:“现在太原附近各县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明朝以后从别处迁来,元以前的住户,仅余极少数了。”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晋中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到了明代,海内一宇,本来社会环境应该安定了,但从明英宗正统年间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北边一直边患严重。先有瓦剌也先、鞑靼小王子、鞑靼达延汗,后有俺答汗一直作乱于今雁北和内蒙一带,甚至常常危及京师,发生过“土木之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先有开中法,后改折色制,也曾断断续续有过马市的开设,边贸的开市,但在战乱条件下,商业是难以长久繁荣的。商人怎敢冒着战火从容经营呢?不仅北部边境如此,就是当时的晋中也每每受到战事骚扰,仅据史料记载: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 年)八月,鞑靼曾兵至榆次、太谷。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又入寇介休、祁县。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又扰掠了介休、平遥、太谷。战乱的最南端曾波及隰县,可平阳府一直安然无恙。所以,明中后期,尽管晋南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晋中仍在一般的商业水平上徘徊。

造成晋中商业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契机是明万历初年蒙古俺答汗和明朝的议和。当时,任宰相的张居正主持防务,他力主议和通市。而此时蒙古贵族恰好也衰弱了,俺答汗也愿和明朝讲

和，从此北边开始平静。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俺答汗死后不久，鞑靼分裂，形成内蒙和外蒙。内蒙的科尔沁部、察哈尔部很快被东北新崛起的满族降服，以后清兵入关，内蒙王公归附清廷，整个内蒙地区变得十分平静。这是晋商向北边拓展的极好机会，晋中商人和明代的晋南商人一样，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进军内蒙市场，进而涉足对外蒙和俄国的交易，成为清代陆上外贸的一支劲旅。

晋中商业明末兴起至清初鼎盛，只经历过一场明末农民战争，但李自成有‘抚流亡、通商贾’政策，一般只杀明朝官吏和豪绅，未对商业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明末一些赴北边贸易的晋中商人，早与占据东北的清王朝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清初的商业活动，还受到清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更有利于晋中商业的发展了。在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中，晋中商人先赴北边，再下南方，承担了组织南北贸易的重任，成为全国市场上的活跃分子。他们既为行商，又当坐贾，把分店遍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山脚下，东海之滨，终于占据了全国商业魁首地位。

二、奇异的历史交叉

晋中商人在参与全国商业活动的实践中，感悟到汇兑款项和存贷资金需要而创立票号，大约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距离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早 20 年。从历史长河的宏观角度看，这 20 年仅是历史的一瞬。换句话说这两种经济力量乃是同一时期共存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这就构成了反差强烈的一组历史交叉：一个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要求由简单的商品经济向较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过渡；另一个是已经过工业革命，处于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的

西方列强，极需对外殖民扩张，亟想占领中国市场，求得自己生产力的再发展。这两种力量在发展中的交会，必然处于相互冲突和敌对的状态，但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若干经济联系。它们各自努力地、顽强地要在中国近代这一历史领域中发挥自己的影响，这样便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甚至很难捉摸的经济史画卷。

我试图打开画卷，进一步分析晋商后期染指金融业的发展轨迹。这里首先有个避不过的问题，就是要回答山西票号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票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具有进步性。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封建性的金融机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我这里先不忙作结论，但想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即山西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它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之必然产物：它既不姓封，也不姓资，但它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不能不走一条崎岖曲折的路。

仅就金融业的发端做比较，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差距太大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威尼斯银行出现于 1580 年，就算比较标准的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格兰银行也早在 1694 年就产生了，而中国的票号到 1823 年左右才诞生，相差近两个世纪。当然，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中，早就产生过汇兑现象，唐之飞钱、宋之便换、明之会票，可谓屡见不鲜。不过，开展汇兑和汇兑专门机构的成立是两码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票号，出现得太晚了，这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一个集中表现。

当西方殖民者试图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晋商正在中国市场上驰骋纵横、春风得意，因此，大本营深蛰内陆的晋商较早地就和外国殖民势力发生了接触。还在嘉庆年间，西方殖民者贩来的鸦片已经比较广泛地流毒晋商故里了。民国版《太谷县志》保存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 1817 年）太谷知县陈履和率领商民到城隍庙宣誓

不贩鸦片入境的碑文，陈履和沉痛地指出：在他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来到太谷上任时就“风闻此邦愚民喜食鸦片”，他要求“自今以往凡吾县中商民，往闽广苏杭置货之人，誓不兴贩鸦片烟一丝一毫入我太谷，害我百姓”。足见当时太谷烟毒已相当严重。此外，当时晋中平川流行‘广货’输入。这广货中实际包括着大量的洋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票号一诞生，就和西方殖民者不陌生。因为，票号是晋商经营起来的。晋商在票号产生前已和外商频频交往，票号产生后又陆续在沿海大城市设庄，这就造成了票商和外商的接触机会，只不过二者接触的范围和深度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罢了。

很明显：山西票号的发展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逆向而行的。山西票号的设庄是先北后南，一开始南方较少，逐渐多起来，逐步地向沿海、边疆和国外扩展。而西方殖民者是先东南沿海，后北部沿海，再内地，逐步深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只确定了五口通商。这五口都在东南沿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的触角才伸到北方来。就票商的故乡山西而言，1861 年 5 月，驻天津的英国宝顺洋行才首次贩布匹到榆次销售，此乃洋行入晋之始。此后 10 年间，洋行在晋的活动范围也仅及太原附近的几个县，对山西工商业的发展均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至于和山西票号直接有利益冲突及业务联系的国外金融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也只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开设银行，北方尚无一家外国银行出现。而在同一时间，即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里，山西票号的祁、太、平三帮正处于上升期，各票庄正从北方城市向南方城市逐步推进之中。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是由山西票号充任着主角，这是毫无疑问的。

发生于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山西票商们来说，既是灾难，又是幸运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战争造成了中部

东部分庄的收缩和裁撤，对票号业务的发展无疑是重大的阻碍。但由于战争造成交通阻断，又为票号承办京饷汇兑业务创造了机会，这不仅扩大了票庄的业务范围，而且使票庄和清政府及大员之间建立起较紧密的联系，为票号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有趣的是，正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山西票商看到国内政治趋于稳定，上海的国内、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日益稳固，才由苏州进军上海的。这就造成了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的一次正面交锋和相互竞争。在票号未进入上海之前，上海的金融市场，除了外国银行势力外，当地的金融组织叫钱庄，原只是经营不同货币的兑换业务。1858年，上海钱庄才开始放款。票号进军上海后，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便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斗。开始，三方金融机构各有分工：“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见《上海金融组织概要》91页）

但不久，钱庄首先败下阵来，它不能适应华商对借贷的需求，只好向票号和外国银行贷款，开始充当外商银行买办的角色。外国银行则逐渐渗透到华商中来。进一步争斗下去，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钱庄的力量又有所壮大，外国银行势力向内地延伸，票号独占国内埠际间汇兑的局面则被打破了，在上海的这场竞争中票号走上了陡坡路。

就全国情况而言，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票号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的时期。不仅山西票商们在全国异常活跃，而且从1863年起，南方商人效法山西票商也开起票庄来，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此时参加票商队伍的。这一时期，不论山西票号，还是南帮票号，他们的业务都开展得红红火火。他们承担起向全国各地商号、钱庄的存、放款业务，间或也向小手工业者借贷。伴随着他们金融势力的扩大，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除汇兑京饷外，票号也承办政府征讨边乱的军需供应等“协饷”，还为清政

府各省借垫各种名目的款项及关税，甚至帮助政府汇兑河工经费、代放赈款等。正是这种与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的经济往来，给人们造成了票号是专为腐朽的清政府服务的误解。其实，山西票号并不是在清政府支持和操纵下成立的金融组织，就是票号汇兑“京饷”，清政府也几次禁止过。它长期和清政府处于难舍难分的复杂多变的状态下。在清政府国家银行成立以前，票号身处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不为政府提供服务。但它的日常的大量业务，还是面对民间面向全国工商业的，它实实在在是受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武断地给它戴上没落的封建经济组织的帽子是不够公允的。

19 世纪 60 年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廷封建官僚中涌现出一批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的洋务派。不管他们办洋务的初衷是什么，近代中国机器工业是从他们手中创始的。洋务派一开始主要靠清政府拨款兴办军事工业，其金融业务自然也无须山西票号染指。但在政府经费没有解到，而又急需用款的时候，它也不得不临时让票号借垫一下，如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自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创办后的 20 多年中，就曾多次向票号借款。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洋务派转营民用工业后，应该说票号为洋务派筹措和调度资金的机会就更多了。但综观票号对“洋务运动”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笔者曾查到三笔票号与洋务派的业务：1873 年，福州船政局因支付法国技师回国时的奖金和路费向福州票号借款 8 万两；1887 年，李鸿章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1905 年福州船政局为还英汇丰银行贷款而向“新泰厚”等票号挪贷。从这三笔业务情况看，都不是什么票号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洋务派也没有把票号作为自己金融上的主要后盾。因此，票号并未能直接参与洋务运动，未能及时投入到创办近代机器

工业的潮流中去。

需要指明的是,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在票号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西方列强的经济魔爪也日益向内地延伸。从 1870 年开始,已经深入到山西票商故里的外国商人不仅推销洋货,而且经办起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外销业务。同晋商长期发展陆上出口贸易——恰克图贸易的俄商,仗着《中俄北京条约》给予的特权,也在北方贸易中占明显的压倒优势。这样,山西票号自然和西方列强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票号担负了中、外货币兑换和国内外货币资金汇兑等业务。他们当然会感受到外国经济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就票号的总业务量和一存一贷、一兑一付之间尚无明显地感受到什么压力。而且从 1879 年起,票号介入到为清政府偿付外债的汇兑活动中,反而从中扩大了业务量,得到了实惠。外国商人也由于外商银行尚未广泛地进入内地而把票号视为不可替代的中国银行业。山西票号在当时的名声确实是中外皆知,汇通天下,异常显赫!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山西票号首先经受了第一次全国金融风潮的冲击,那是由著名南帮票号阜康的倒闭而引起的。阜康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票号。1883 年胡雪岩从事生丝投机,因受外商抑价而破产。这给整个票号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山西各票号自然普遍波及,但当时山西票号倒闭的仅谦吉升一家,到 1890 年后才又出现了元丰玖的倒闭。就是说,山西票帮在这次冲击波中基本上都挺过来了,并未伤着元气。不过,19 世纪 80 年代对票号来讲已是危机四伏,不仅胡雪岩的破产是中外经济较量中的一次重大失败,上述票号在上海与外商银行的斗法中也渐渐失去了埠际汇兑的优势,而且新兴的近代通讯和交通业的发展也对票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光绪四年,即公元 1878 年,清政府聘用的英人总税务司赫德创办近代邮政;1879 年,李鸿章招用丹麦人试办天津、大沽间